

四川藏区 民居图谱

甘孜州康东卷

《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编委会◎编著



旅游教育出版社

四川藏区民居图谱

—甘孜州康东卷

总策划：郝康理

总顾问：杨嘉铭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

成都高榜旅游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联合编制



旅游教育出版社

策 划: 赖春梅

责任编辑: 贾东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藏区民居图谱: 甘孜州康东卷 / 《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编委会编著.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637-3447-4

I. ①四… II. ①四… III. ①民居—建筑艺术—甘孜—图谱 IV. ①TU241.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2225号

《四川藏区民居图谱》丛书

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甘孜州康东卷

《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编委会 编著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 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传真)
本社网址	www.tepcb.com
E-mail	tepx@163.com
印刷单位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323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36.00元

编委会

丛书总策划：郝康理

丛书总顾问：杨嘉铭

《康东卷》分册编委会主任：葛 宁 郑学炳

《康东卷》分册编委会副主任：肖 锋 游 勇 刘开榜

《康东卷》分册编委会成员：刘 宏 陈彦华 刘圣湍 欧阳建淮 杨 涛 李章剑 吴 鹏
吴 丹 盘秋风 唐 沅 刘津语 陈 凯 骆 洋

《康东卷》分册摄影师署名：刘圣湍 刘津语 泽 里 高秀清 何行铭 洛日俄色 杜 娟

主编单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

联合编制

成都高榜旅游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藏区的民居建筑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沃土上的藏族先民的一种文化创造,无论是选址,还是建筑物造型,亦或是建材选取、空间布局、房屋功能、力学原理、光热资源利用、抗震防震,以及与自然生态环境的高度协调等方面都别具匠心。区内的民居不仅分布广泛,而且建筑类型十分丰富,著名的民居聚落有康定木雅民居、道孚崩空民居、色达格萨尔藏寨、乡城白藏房、稻城黑藏房、道孚扎坝民居、理塘千户藏寨、巴塘红藏房、丹巴甲居藏寨、马尔康西索民居、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壤塘日斯满巴碉房、白玉山岩戈巴民居、黑水色尔古藏寨、马尔康松岗直波碉楼、理县甘堡藏寨等等。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加强,区内的一些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较高的民居及其村寨都分别被列为各级别的文化遗产,并得到有效的重视和保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且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马尔康松岗直波碉楼、壤塘日斯满巴碉房等。经过认真调查和充分论证,“四川藏羌碉楼与村寨”已被列入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30个储备项目之一。此外,四川藏羌地区的碉楼建造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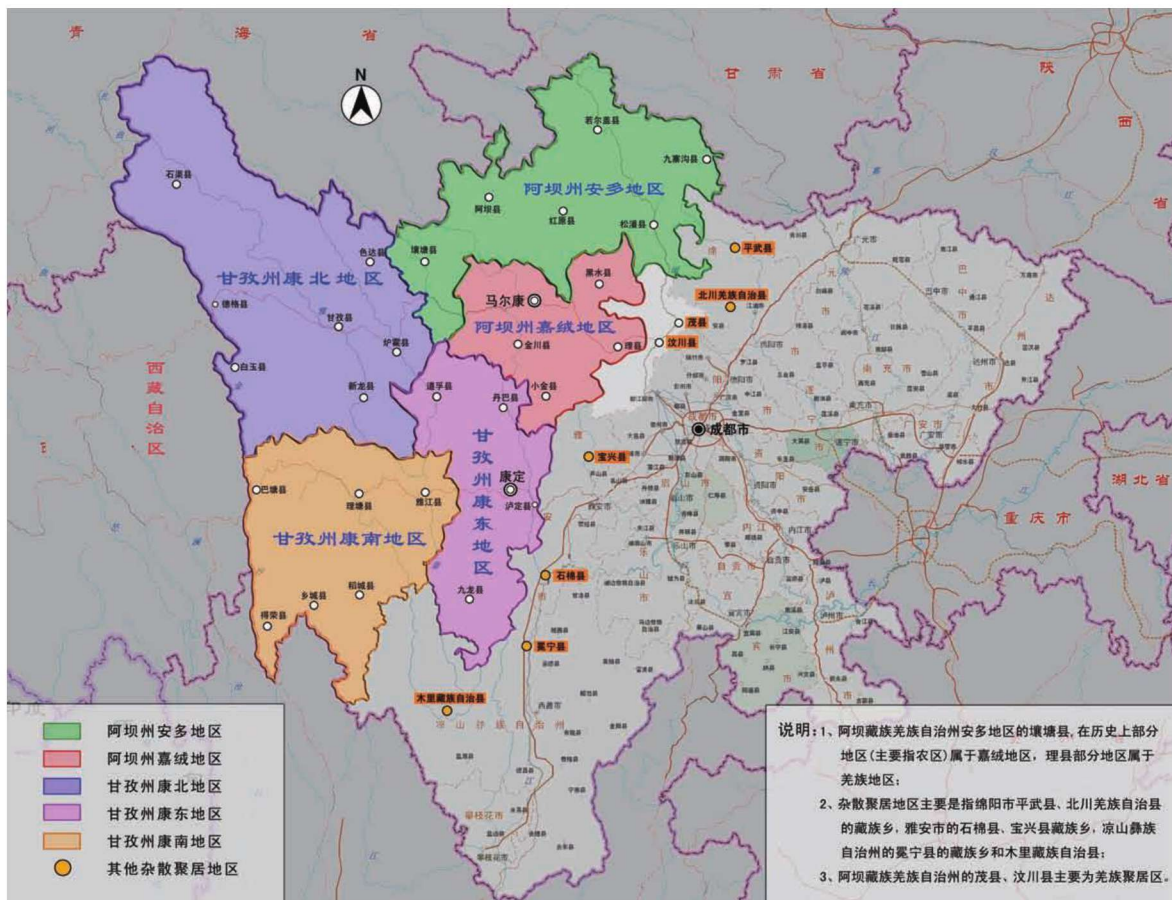
四川藏区的民居不仅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四川西部旅游中一道最受游客青睐,集生态、人文为一体的风景线和旅游产品。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藏区民居就已经开始受到游客、学界

的关注,游客把四川藏区民居比作是当地旅游的“名片”,学界将其称为“活着的化石标本”。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相继推出了“中国最美乡村”评选活动和“中国人的景观大道”特别专栏,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的丹巴藏寨名列榜首,在“中国人的藏式景观大道”中以“凝固在川藏大地上的建筑符号”为题,生动展示出了康巴民居的风采。旅游规划部门在规划当中,对四川藏区民居的资源优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着力加以利用和开发。

2014年,四川省委、省政府为深化和加快四川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出台了《四川藏区旅游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将藏区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态旅游经济上来,建立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部署。在“北有九黄,南有亚丁”两大国内外著名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基础上,甘孜藏族自治州正在编制《甘孜州全域旅游发展规划》,阿坝藏族自治州正在编制《阿坝州国际旅游目的地体系规划》,四川省旅游局为了进一步贯彻省委、省政府《四川藏区旅游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建设《中国最美景观大道——318/317川藏世界旅游目的地》的设想。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四川藏区经济的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四川藏区富民增收、保护生态、促进开放、促进城镇化转型和拉动经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然选择。

四川藏区生态旅游一方面承载着拉动区内社

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龙头使命，同时也担负着对资源保护的重大责任，这是四川藏区旅游的全域性和生态性特征所决定的。四川藏区民居是区内旅游资源中特品级的重要资源，其在旅游中的利用率，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高，自然，其受关注度也很高。为了全面展示四川藏区民居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品格，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四川藏区多姿多彩的民居及其旅游价值，进一步挖掘四川藏区民居在该地区旅游业发展中的潜力，出色汇集四川藏区民居科学、系统的保护“记忆档案”，在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业内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作为四川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四川省旅游局，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决定依托甘孜州、阿坝州、木里县旅游局，省内相关旅游规划研究设计院，长期致力于藏族建筑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编写组，编辑出版一套《四川藏区民居图谱》丛书。



《四川藏区民居图谱》丛书系列共7卷，它们分别是《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甘孜州康东卷》、《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甘孜州康北卷》、《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甘孜州康南卷》、《四川藏区民居图谱——阿坝州嘉绒卷》、《四川藏区民居图谱——阿坝州安多卷》、《四川藏区民居图谱——杂散县乡卷》、《四川藏区民居图谱——重要文化遗产及帐篷卷》。在上述7卷中除《四川藏区民居图谱——重要文化遗产及帐篷卷》外，其余6卷均按区域立卷，每卷不少于10个代表性村落、50户典型民居。民居和村落展示内容均为实地考察所绘制的建筑图、摄影图片和文字信息。《四川藏区民居图谱——重要文化遗产及帐篷卷》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四川藏区民居类的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二是具有代表性的古碉遗存，三是纯牧业地区的牦牛帐篷以及各地代表性的休闲帐篷。《四川藏区民居图谱》丛书系列从区域来讲，覆盖了四川藏区的两州一县以及一些杂散地区的藏族乡；就民居建筑而言，覆盖了区域内的所有类型；充分体现出“全”字。丛书系列各卷在内容编写上始终坚持田野调查，特别是民居和村寨的考察、测绘、拍摄、采访资料，都来自编写组人员的第一手实地作业成果，体现出“真”字，从而使整套丛书的真实性、可靠性、学术性得到保证，使整套丛书的深度、厚度、高度和亮度得到充分体现。

花大力气编写《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系列丛

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编写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四川藏区民居是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旅游资源优势十分突出的重要文化遗产。全面、真实地对四川藏区的民居进行整理，形成真实而又全面、系统的“记忆档案”，摸清家底，在当前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且迫在眉睫的抢救性保护工作。

二、随着四川藏区生态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和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十分需要能够为上述工作提供借鉴和咨询的具有四川藏区本地特色民居信息的基础资料，以实现《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的可利用价值。

三、《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的出版发行，从客观上讲，是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对四川藏区民居的宣传：让更多的游客、读者来认识和了解四川藏区民居的风采；让更多的游客对四川藏区的生态旅游更加向往，更加倾心；让更多游客到四川藏区，亲身体验藏家乐、牧家乐的情怀，零距离接触天人合一的美丽藏寨，亲眼目睹神秘古碉的风采。

四川省藏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众多世界遗产级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四川藏区这片神秘的净土上，蓝天白云下的雪山、草甸、峡谷、森林、湖泊等自然资源四季如画；经幡、寺庙、玛尼堆、佛塔等宗教元素庄严圣洁；民居建筑、民族服饰、民族歌舞、民间技艺等迥迤多姿，

千百年来保持着最为浓郁的“藏族”情愫；美景与丰富多彩的藏族文化好似孪生姐妹一般，给四川藏区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四川藏区的民居建筑，便是这片秘境中自然财富与人类智慧的典型缩影。这里的民居建筑材料是大自然的馈赠，建造方式、建筑格局和装饰体现的则是浓缩的地域文化，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集中地融合在藏式民居建筑中，这就是最完美的“天人合一”，这就是四川藏区名副其实的文化“名片”和旅游“名片”。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四川省藏区旅游业迅猛发展，旅游业正在成为重要的民生产业和促进藏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产业引擎，因此，保护和利用这份珍贵的资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藏区社会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的当今，藏区人民也在享受着建筑科技成果，在新型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的影响下，藏区传统民居的建筑风格和技艺已受到较大的冲击，藏民居建筑的变迁或将成为必然趋势。作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极其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传统藏民居建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项非常急迫的任务。为此，2014年8月，四川省旅游局设立专门课题，编辑《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系列丛书，旨在为四川藏区各类典型传统民居建筑技艺的保护和传承提供资料信息，同时

也为藏区旅游开发中的传统民居建筑提供必要的技术参考。

在《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系列丛书中，我们既记录各类建筑的风貌，又记录人文环境；既记录下经典传统建筑，又记录下建筑的逐步改良变化；既记录了建筑结构和材料，又适当记录了建筑过程中的技艺和方法。这些形态各异、类型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的藏式民居，既代表着四川藏区的建筑文化，也是四川藏区民众生活场景最为真实的写照。

《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我们对四川藏区生态旅游优势资源进行有效保护所作的一种尝试，其主旨是摸清区内民居的家底并做记录，以便为今后民居村寨的旅游发展、为新农村的建设作出一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我们相信，《四川藏区民居图谱》系列丛书的出版发行，还能够为四川省藏区的旅游宣传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不仅希望全社会藉此更深入地了解四川藏区独特而又宝贵的建筑文化，产生到四川藏区旅游观光和旅游投资的热情，更希望通过普及藏民居建筑的相关知识来唤醒人们保护藏区以及其他地区建筑文化的意识。

丛书编撰委员会
2015年年初

前言 / 01

绪论 四川藏区民居的文化历程与乡韵 / 001

第一章 甘孜州康东民居导论 / 015

第一节 康东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环境 / 016

一、自然生态环境 / 018

二、人文生态环境 / 019

第二节 康东民居类型 / 021

一、康东民居的基本类型及总体特点 / 021

二、康东农区 6 类民居 / 025

第二章 康东地区典型村落 / 051

第一节 康定县民居村落 / 052

一、康定县鱼通区麦崩乡厂马村 / 052

二、康定县甲根坝乡提吾村 / 054

三、康定县朋布西乡日头村 / 055

第二节 道孚县民居村落 / 057

一、道孚县鲜水镇崩空民居聚落 / 057

二、道孚县甲宗乡银克村 / 058

三、道孚县下拖乡下瓦然村 / 060

第三节 九龙县民居村落 / 061

一、九龙县呷尔镇华丘村 / 061





二、九龙县子耳乡万年村 / 062

第四节 丹巴县民居村落 / 063

一、丹巴县聂呷乡甲居藏寨 / 063

二、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 / 065

第三章 康东地区民居图谱 / 067

第一节 康定县木雅民居 / 068

第二节 康定县鱼通民居 / 119

第三节 道孚县崩空民居 / 123

第四节 道孚县扎坝民居 / 152

第五节 九龙县木雅民居 / 157

第六节 九龙县（吕汝、尔苏等）小族群民居 / 166

第七节 丹巴县嘉绒民居 / 188

绪论

四川藏区民居的文化历程与乡韵

杨嘉铭

一、引子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民族，都有其与生俱来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质，这种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质，总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化的变迁而显得更加具有个性和张力。民族建筑，既然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民族的烙印，并形成与不同民族的社会背景、生存环境、经济生活、文化、心理特征、审美情趣相映衬、相协调、相统一的建筑风格。民居是民族建筑中最原初的建筑，所以它带有根基性，是人类其他种类建筑的源泉之所在。民居始终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所以也就更加具有生命之活力，人们建造它，享用它，从而也赋予它更多的故事，更多的情愫。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居是人们的家更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它留下了极为深刻而又耐人寻味、多姿多彩的历史记忆。

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勤劳、坚毅、质朴的藏族人民，用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执着的追求精神，构建起了经历五千年岁月洗礼的建筑文化

大厦，在这个建筑文化大厦中，民居不仅是其中最历久弥新的一个体系，更是其中最根深叶茂的建筑文化根脉。

按照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藏族主要分布于西藏自治区以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西藏自治区是藏族最早形成的地区，也是藏族文化的发祥地。公元七世纪，随着吐蕃王朝的建立，吐蕃势力逐步东渐，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的部分地区先后被纳入吐蕃的势力范围，在吐蕃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历经宋、元两朝，四省部分地区的众多族群，逐渐融入到藏族之中，从此藏族文化在这些地区扎下了根。西藏的建筑文化自然也在四省藏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成为藏族建筑文化的覆盖区域。故一直以来，人们都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藏区的建筑与西藏的建筑统称为藏族建筑或藏式建筑。换句话说，也就是四省藏区的藏族建筑具有西藏建筑的同质性特征。但是，由于四省藏区的藏族在还未形成以前，区内的各族群就已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积淀在历史的演进中，继续成为一种文化惯性而延续下来，成为自己极富个性的文化特征，这便是区域性特征。就建筑而言，同

质性和区域性并行相融是客观存在的。

在不同功能类型的建筑中，由于西藏与四省藏区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所以诸如宫殿建筑、宗堡建筑、园林建筑等，四川藏区都不具备。而在藏传佛教建筑、民居等功能类型的建筑中，四省藏区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更多地保持了与西藏同类型建筑的同质性特征；而民居则不然，四省藏区的民居则明显地体现出同质性与区域性共融并存的特征。

四省藏区的民居中，除受制于各自的文化惯性的影响外，各地的生态环境、地理区位等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再加之民居的乡土性浓郁，而人们对自身居所的建造，更易受到自主性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彼此之间，也都存在着各自较突出的个性特点。

二、四川藏区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

（一）四川藏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按照我国的现行行政区划，藏族主要分布于我国西藏自治区、四川、青海、甘肃、云南五省（区）。四川藏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位于四川省西北部，东与四川盆地、川西南山地相接，南邻云南省，西连西藏自治区，北接青海和甘肃两省；幅员面积 24.97 万平方公里，约占四川省总面积的 51.5%。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四川藏区总人口为 186.92 万人，其中藏族人口占区内总人口的 64%。由于四川藏区的总人口和藏族人口的数量，仅次于西藏自治区，故有全国第二大藏区的说法。

四川藏区除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木里县）外，还包括绵阳市平武县、北川县，雅安市宝兴县、石棉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冕宁县、甘洛县、越西县等县境内的少数藏族乡。

甘孜州共辖 18 个县，分别是泸定县、康定县、九龙县、丹巴县、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新

龙县、德格县、白玉县、石渠县、色达县、理塘县、巴塘县、乡城县、稻城县、得荣县、雅江县。阿坝州共辖 13 个县，分别是马尔康县、金川县、小金县、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壤塘县、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九寨沟县、黑水县。以上两州计为 31 县，加上木里县，四川藏区共为 32 县。

四川藏区是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系的核心地区，同时也是巴颜喀拉山系伸延的地区之一。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为 3500 米以上。境内雪山高峻，草原辽阔，峡谷深邃，境内地貌依地势高低、河流切割深度和地表特征可分为丘状高原区、高山原区和高山深谷区三个类区。丘状高原区主要为草原牧业区，高山原区以农业为主，兼有草原牧业（又称半农半牧区），高山深谷区为典型的农业区。

境内山脉主要属于横断山系和巴颜喀拉山系。在甘孜州、木里县境内的主要山脉有沙鲁里山脉、大雪山脉、巴颜喀拉山脉。在阿坝州境内的主要有龙门山脉、岷山山脉和邛崃山脉。在众多高山中，大雪山脉的主峰贡嘎山海拔 7556 米，是境内最高的山峰，素有“蜀山之王”之称。

境内河流众多，分属于长江、黄河水系，其中长江水系是境内的主要水系。在甘孜州境内的主要河流有金沙江、雅鲁江和大渡河。在阿坝州境内的主要河流有黄河水系的黑河、白河、贾曲；属于长江水系的岷江、白龙江、涪江等河流。在众多河流中，金沙江作为长江上游的干流，是四川藏区境内最大的河流，在境内的流长达 650 多公里，流域面积达 4.4 万平方公里。上述河流流经的最低海拔地分别为大渡河流经泸定县的出境段和岷江流经汶川县的出境段，海拔均在 1000 米左右。

境内的海拔高差达 6500 多米，是青藏高原上我国境内海拔高差最大的地区。其自然生态最大的特点是：一是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二是随海拔和纬度的增高，从东南向西北地跨亚热、温、寒三大气候带；但在东南高山峡谷地带，从山麓

到山顶,又依次出现垂直立体气候带,呈现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景象。三是境内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等主要河流均为南北走向,主要山脉沙鲁里山脉、大雪山脉、邛崃山脉、岷山山脉等亦顺江河流向,由北向南伸延,从而形成了南北走向的天然大走廊。四是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促成了多样化的生态景观。

（二）四川藏区的人文生态环境

据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四川藏区境内就已有土著先民繁衍生息,开创文明。他们是区内最早的主人。羌,是我国历史上形成较早的部族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西北地区古羌部族中的一部分,逐渐向西南迁徙,四川藏区是古羌部族向西南迁徙的重要通道和留居地。古羌人迁入后,通过与境内土著先民的较长时期的交往、兼并、融合,在西南地区形成了许多新的族群体系。《史记·西南夷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自同师以东,北至牂牁,名为牂、昆明……自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在四川藏区也是如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在“冉駹夷”条也有“六夷、七羌、九氐”之说。及至汉代,四川藏区境内的部落和部族依然众多,或夷、或羌、或氐。其中代表性的部落和部族主要有白狼、槃木、唐菽、冉駹、牦牛等,及至南北朝到唐初,还有附国、党项、白兰、东女、嘉良夷等。

汉代,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地区,推行羁縻制,先后设置了汶山郡、沈黎郡等,这是中央王朝治理四川藏区之始。及至唐代中央王朝对川西北地区的治理有了很大的加强,除了在区内设置松州都督府、茂州都督府、保宁都督府等机构外,还延续了汉代以来的羁縻制度,设立了众多的羁縻州。例如在贞观时期,在松州都督府范围内,羁縻州达37个,在茂州都督府范围内,羁縻州达到104个之多。

公元7世纪中期以后,吐蕃王朝开始兴兵东

扩,先后将当今的青海、甘肃、云南、四川等省藏区的各部落、部族纳入其统治势力范围。据史料记载。在四川藏区境内,就有白狼、白兰、附国、党项、东女、嘉良、白狗、哥邻等众多夷、氐、羌部落和部族为吐蕃征服。吐蕃在这些地区的部落和部族中安置了许多移民并派兵驻守,传播吐蕃文化。大批吐蕃移民和军队,与当地臣服的各部落、部族相互杂处、交往,逐渐融合同化,直至公元13世纪以后,其同化过程才基本完成。

元代以来至清,历代中央王朝在藏区推行土司制度,其间经历了元代土司制度的初兴,明代土司制度的发展,清代土司制度的完善三个时期。及至清代中后期,中央王朝逐渐实施“改土归流”之制,清末,四川藏区的“改土归流”才告一段落。

在藏文典籍中,习惯将五省藏区划分为三个文化地理单元,称之为“却喀松”,即卫藏、安多、康三区。在四川藏区中,甘孜州和木里县属于康区的组成部分之一,阿坝州中的阿坝、红原、若尔盖、壤塘、松潘、九寨沟等县为安多地区,而金川、马尔康、小金、黑水,以及理县、汶川的部分地区为嘉绒地区。嘉绒地区,严格地讲,从藏族传统的三大文化地理区域概念出发,在一些历史文献中,将其归为康区。但在很多文献中,按历史习惯,单独区分为一个特殊的小文化地理单元。所以,在四川藏区,大致可以归纳为康、安多、嘉绒三个文化地理单元。

在四川藏区内部,除主体民族藏族外,在历史上还世居着羌族、回族、纳西族、汉族、彝族等其他民族。其中羌族在少数民族中,不仅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且人数众多,藏区内的汶川、理县、茂县是我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区,羌族是阿坝州的主体民族之一。

综上所述,四川藏区的藏族,在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大的融合过程,一次是春秋战国至唐的较长历史时期,区内的土著先民与古羌人的融合。另一次是自唐以来至宋、元时期,当地被称之为夷、羌、氐的部落、部族,逐渐融入到藏族之中,

成为我国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区内的羌族与藏族长期为邻，或相互杂处，加之在族源上又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所以，羌族文化对四川藏区的藏族文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自汉以来，历代中央王朝均对四川藏区进行了直接的管理和施政。自宋以来，川藏茶马互市一直延续上千年，加之四川藏区紧邻四川盆地，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甚为密切，受影响甚深。随着历史的发展，迁徙到四川藏区的汉族，或为官、或经商、或农耕、或务工、或为文，其中许多人与藏族通婚，并成为藏族中的一分子。此外，还有纳西、回、彝等少数民族，也为四川藏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四川藏区的文化多元性的又一个方面。

三、四川藏区民居的基本类型

关于民居的分类问题，目前学术界大多数观点都倾向于大建筑的分类方法，即材料质地分类和功能分类。在探讨四川藏区民居类型时，是否还可以在遵循上述两种类型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回答应是可行的，因为这也是根据四川藏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进程而提出来的，同时也是更具体地体现四川藏区民居特色的一种方式。

按照材料质地分类，四川藏区民居大体上可以分为土木结构、石木结构、木结构和织品结构等类型。

所谓石木结构，是指建筑物的围护结构主体是以天然石块和黏土为建筑材料，采用砌石技术砌筑的石墙体，但建筑物的内部空间或者外部，除门、窗外，高层部分还配以少部分木结构。

土木结构与石木结构建筑不同的是，其围护结构主体是主要使用天然黏土为建筑材料，采用夯筑技术夯筑的土墙体。

织品结构建筑主要是以牦牛毛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经过人工纺织成毛褐子，再缝制搭建的可移动建筑物。

木结构类型的民居建筑，在四川藏区为数不多。在农村多为单层崩空造型的民居，在城镇则主要为汉式穿斗式造型的民居。

按照功能分类，四川藏区的民居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百姓居住的民居。这种民居统称为民房，它包括城镇民居、农村民居和牧区牧民的帐篷，是四川藏区功能性民居的主体。

第二种是土司官寨。四川藏区自元代推行土司制度以来，土司制度不断发展，各地的大小土司都建有自己的官寨，官寨便成为四川藏区民居历史上的制度性产物。在四省藏区中，四川藏区的土司是最多的，以甘孜州为例，在清代就有大大小小土司122个，授大小土司职127员。上述授职的土司都曾有过规模不等的官寨。土司官寨除供土司及其家人居住外，还有所谓代行中央政府所委以的政务的职能，所以在建筑物内还设有“公堂”，办理公务，再次，还居住有专门供土司使唤的差民和奴隶。这种建筑，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多功能性的民居。在历史上，四川藏区的著名土司官寨有德格土司官寨、甘孜孔萨土司官寨、甘孜麻书土司官寨、康定明正土司官寨、巴塘大营官寨、丹巴巴底土司官寨、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马尔康梭磨土司官寨、松岗土司官寨、金川促浸土司官寨、小金沃日土司官寨等。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后，随着土司制度的彻底废除，土司官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历史建筑形式，保留下来的土司官寨被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例如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丹巴巴底土司官寨，现分别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种是藏传佛教寺庙中的僧侣的扎空（僧房）。在过去的许多研究成果中，寺庙僧房都被归入到寺庙建筑中。其实，僧房也是民居，它的居住者也来自于普普通通的农牧民。不同地区的寺庙僧房，都始终保持着当地民居的基本格调，是不同地区民居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种是从民居中派生出来的一种特殊建

筑,在藏语中被称为“卡”或“宗”,其意为碉楼,这种建筑物在四川藏区是最具特色的一种防御性建筑。其功能十分特殊,专事防御。不仅其历史相当久远,其造型也别具一格。在四川藏区的许多农村,都有与各自家庭相连、与村寨相关的碉楼,它们与农区民居血脉相连,相互映衬,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也成为一种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倍受人们的珍惜。

按材料质地类型和功能类型的民居分类,基本囊括了四川藏区民居的类型。但是这两种分类方法仅仅是建筑学上的分类方法,在藏区民间,人们习惯上从文化的视野出发,将不同区域及与区域相对应的族群所建筑并居住的民居按照文化类型来命名和分类,这种分类方法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也更能体现出民居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个性。在四川藏区,按文化类型对民居进行分类的方法较为常用,例如康东地区木雅民居、扎坝民居、鱼通民居、嘉绒民居等等,都是以文化类型来分类的。

四、四川藏区民居的发展历程

四川藏区民居,走过了一条历时数千年的漫长之路。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是萌芽时期。据考古发掘证明,早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四川藏区的大渡河流域就已有许多古代土著先民从事农耕,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定居聚落,既然定居,完全可以推测当时的土著先民已经有了原始的居所。据《丹巴县志》载,丹巴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发掘中就发现有“房基址。……房址共发现七座,形状为长方形,墙体为石块砌成,内壁抹黄色泥土,其间还发现多处含料姜石的黄土硬面,结构紧密”。在7处房址中,其中年代最早的为2号房基,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经碳十四测定法测定,“其年代为距今35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前期”。由此可以认为,四川藏区民居的萌芽时期大致为距今5000年新石器时代至商代

早期。其时“累石为室”的民居形式已现端倪。

二是雏形时期。这个时期的上限应为商代,下限则为唐代,即公元前15世纪左右至公元9世纪。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及至东汉时期,居住在大渡河流域和岷江流域的冉駹夷部族的石砌建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之室,高者十余丈,谓之邛笼”。这说明当时的石砌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可以建造高大的石砌建筑物。及至公元5世纪至公元9世纪初,四川藏区大渡河流域、雅砻江流域,乃至金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石砌民居建筑的范围不仅广,而且建筑技术也更有精进。在《北史》和《隋书》“附国条”下,均有“其国南北八百里,东南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山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礪而居,以避其患。其礪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礪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的记载。在《新唐书·东女国》条下,有“所居皆重屋,王九层,国人六层”的记载。从汉代的“邛笼”,南北朝、隋代的“礪”,至唐代东女国的“重屋”,相关记载和描述均说明,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9世纪,四川藏区的石砌民居建筑技艺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在这一时期内,碉楼建筑早已从民居中脱胎而出,并成为一种以防御性功能为主的特殊建筑。

三是发展和成熟时期。这个时期大致经过了宋、元、明、清、民国五个时代,时间大致为公元10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期的近一千年时间。之所以把四川藏区民居的发展和成熟时期定格在这一时期内,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四川藏区民居建筑在萌芽时期至雏形时期,从十分有限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区内民居建筑中石砌建筑发展程度相当高,在整个青藏高原上,以高致胜的特点十分突出。但从整个民居系统而言,客观上还存在很多如类型、艺术风格、建筑理念、审美意蕴等方面的缺陷。

(二)所谓四川藏区民居,是指以藏族建筑

风格为主体的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以前四川藏区的民居,应当是融合了夷族和古羌族文化元素的一种建筑。尽管四川藏区与西藏同处于青藏高原,两个区域内的先民有着大致相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在文化上却有着一定的差异。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扩张,吐蕃军队和移民迁入,四川藏区文化的同化过程逐步加快,吐蕃时期建筑文化的许多元素也随之移入,并开始对四川藏区民居风貌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促成四川藏区民居藏族化的最重要因素。

(三)影响四川藏区民居变革的另一个原因是西藏苯教和藏传佛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客观地讲,西藏的苯教和藏传佛教建筑的根脉自然是西藏当地的民居和印度、尼泊尔的佛教建筑,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苯教和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得到了提升,成为藏族建筑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宗教建筑随着苯教和藏传佛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开始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致使四川藏区的民居开始吸纳宗教建筑的一些元素,并融入其中。例如,民居中的色彩、民居中的一些装饰物,甚至民居建筑中的一些宗教功能性的用房和设施也在民居中得到体现。宗教文化在藏族文化中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影响到整个藏族社会的方方面面,藏族建筑也就自然受到宗教文化的熏陶,从普通民居到规模巨制的藏传佛教寺庙,从建筑物的选址动工一直到新居落成乔迁,无不受到宗教的影响。

(四)随着从元朝到民国时期四川藏区社会的发展和历代中央政权对四川藏区治理的不断加强,区内的政治管理体制不断革新,汉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亦日益频繁。这些自然也对区内的民居建筑产生了影响,对四川藏区民居体系的完善,乃至建筑技艺的提高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元代,区内便开始推行土司制度,土司作为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自然会大兴土木,修建自己的官寨(或称衙门)。兴起的土司官寨,成

为四川藏区民居建筑中的一个分支系统。另外,因为土司的权力,或是一些百姓为了寻求土司的庇护,便逐渐以土司官寨为中心,形成了较大的聚落,这些聚落便成为清末“改土归流”时期和民国时期城镇的雏形。较大的聚落有甘孜州的巴塘县的夏邛镇、甘孜县的甘孜镇、德格县的更庆镇、炉霍县的新都镇、理塘县的高城镇等。

四川藏区最早的两个城镇,一是阿坝州的松潘县,二是甘孜州的康定县。这两个城镇的形成时间虽然早晚不一,但促使城镇形成的因素都大同小异,首先是中央政府在区内设立建制,其次这两个地方都与汉族地区相邻,其三这两地都是汉藏茶马互市的重要贸易口岸和物资集散地,同时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所以这两个城镇虽然不及内地县份的规模,但作为城镇而言,却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除城镇形成之外,由于川藏茶马互市口岸的西移和繁荣,康定成为汉藏贸易的重要口岸,于是出现了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民间社会机构——锅庄。锅庄最初的建筑是砌石建筑,当地人们称住在锅庄里的人“阿佳卡巴”,意思是碉楼的贵妇人、锅庄主。“卡”即是指碉房。加之康定当时已经成市,许多汉族商人都迁居其地,有许多依街而建的连铺带居的汉式建筑、四合院,对康定城镇的藏族民居所产生的影响较为突出。于是,康定的锅庄主便纷纷效仿,在康定修建了集仓储、客栈、作坊、马厩、居住、交易为一体的,仿汉式四合院的院落型锅庄。从清朝至民国时期,这种锅庄达四十八家之多(有资料称七十余家)。这种由藏族人经营的多功能民居,便成为四川藏区城镇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城镇民居。

至清以来,随着汉藏贸易和文化交流加强,陆续有内地的汉族工匠(主要是木工和铁工等)迁入到四川藏区,他们不仅为当地藏族修房造屋,同时也将木工技术传授给了当地藏族,这对藏族民居建筑木作部分技术和艺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